

3-5
2001 年贵州省软科学研究课题

西部大开发与贵州省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研究

贵州大学课题组

课题主持人：洪名勇

课题参加人员：王秀峰、洪影秋、余维祥、刘经伟、汤保荣

F121.21
6-3(DY)

目 录

2001 年贵州省软科学研究课题

西部大开发与贵州省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研究

贵州大学课题组

课题主持人：洪名勇

课题参加人员：王秀峰、洪影秋、余维祥、刘经伟、汤保荣

目 录

成果摘要	1
第一部分 西部大开发与贵州省国有经济布局调整：一个新的分析模架	8
§ 1 初始条件、国有经济调整与省区经济非均衡增长	8
一、初始条件、制度变迁与省区经济非均衡增长	8
二、初始条件、国有经济调整与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	10
三、西部大开发与国有经济调整——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12
§ 2 国有经济调整与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的分析	12
一、国有经济调整：工业国有经济调整与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	12
二、国有经济调整：投资体制改革的区域差异	14
三、国有经济调整：就业体制改革的区域差异	14
§ 3 初始条件、国有经济调整与省区经济非均衡增长的实证分析	15
一、经验分析	15
二、实证分析	17
三、研究结论及政策含义	18
第二部分 国有经济规模的理论与实践	19
§ 1 国有经济规模：一个理论问题	19
一、国有经济规模的若干理论论证	19
二、国有经济规模的内生性	20
§ 2 国有经济规模：国外实践	23
一、国有经济规模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23
二、国有经济规模的变化	24
§ 3 国有经济规模：中国的实践	25
§ 4 简单的结论及启示	28
第三部分、国有经济布局理论与贵州省国有经济布局的产业选择	29
§ 1 马克思主义国有经济、国有经济布局理论及实践	29
一、国有经济理论	29
二、国有经济布局理论	32
三、资本置换（都匀模式）对国有经济产业布局的修正	34
§ 2、现代国有经济布局理论与贵州省国有经济布局的产业选择	35
一、现代国有经济布局理论	35
二、贵州省国有经济布局的产业选择	38
第四部分 建国以来贵州国有经济布局的历史演变及评析	42
§ 1 改革开放前国有经济的调整及演变过程	42
一、官僚资本的没收和国有经济的建立	42
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	42
三、“一五”计划与贵州国有经济布局演变	43
四、大跃进、经济调整时期与国有经济布局的变化	43
五、三线建设与贵州国有经济布局的变化	44
六、改革开放以前国有经济布局变化的特征	44
§ 2 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国有经济布局变化分析	47
一、国有经济布局变化分析	47

二、国有经济布局变化的特征·····	50
§ 3 80年代中期以后国有经济布局变化分析·····	52
一、体制条件的转换·····	52
二、国有经济布局变化·····	53
三、国有经济布局变化的主要特点·····	55
§ 4 对以往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评析·····	56
一、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基础是国家计划·····	56
二、增量调整是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主要方式·····	56
三、允许、鼓励非国有经济的发展·····	57
第五部分 贵州国有经济布局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58
一、贵州省国有经济布局现状的总体情况分析·····	58
二、国有经济产业布局分·····	60
三、贵州省国有经济布局及国有企业面临的问题·····	62
第六部分 贵州省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对策·····	64
§ 1 贵州国有经济布局战略调整的原则·····	64
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	64
二、有进有退出的原则·····	64
三、以市场调整为主的原则·····	65
四、国有经济战略调整、改组和产业结构升级结合起来·····	66
五、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的原则·····	66
§ 2 我省国有经济布局战略调整的方向·····	66
一、加强战略性领域·····	66
二、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	67
§ 3 贵州国有经济布局战略调整的方法设计·····	68
一、确定战略性门类和企业名单,设计政府对这些门类和企业的控制方法·····	68
二、国有资本退出的竞争性门类及退出步骤设计·····	76
三、贵州省国有资本退出竞争性领域的方法选择·····	77
四、贵州省国有经济布局调整要处理好的几问题·····	82
附录部分 案例调查·····	91
案例 1 产权转让是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领域的有效途径 ——对安顺制药厂产权转让案例的调查分析·····	91
一、一段辉煌的历史·····	91
二、企业产权改革的必要性·····	91
三、企业产权转让的过程·····	92
四、产权转让后企业绩效分析·····	94
五、安顺制药厂产权转让的成功经验·····	95
案例 2 股份合作制是中小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途径 ——安顺变压器厂股份合作制改制案例分析·····	97
一、企业的基本情况及改制前经营绩效的变化·····	97
二、股份合作制改制的总体思路和主要内容·····	97
三、企业改制后的绩效分析·····	99
四、简短的结论·····	101
主要参考文献·····	101
后记·····	104

成果摘要

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初始条件、改革速度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关系进行梳理和评析的基础上,我们构建和发展了一个关于初始条件、国有经济调整速度与省区非均衡增长的新分析框架来研究西部大开发过程中进行国有经济调整的理论基础。我们先提出了一个理论假说:国有经济调整是省区经济非均衡增长的内生变量,国有经济调整速度对省区非均衡增长具有重要影响。然后运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不同省区之间初始条件、国有经济调整速度和省区经济非均衡增长的资料进行了计量检验。我们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初始条件和国有经济调整速度对省区经济非均衡增长都有一定的影响,从 1978~2000 年,改革开放之初 1 元人均 GDP 平均对以后人均 GDP 的贡献是 4.465 元,而国有经济调整,即 J_t 的值每调整一个百分点,其对人均 GDP 的贡献达到了 13.80 元。从某种程度上讲,国有经济调整速度对省区经济非均衡增长的作用比初始条件还要大,因此,贵州省实施西部大开发,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结合贵州的实际,切实推动我省国有经济调整。

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规模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有其一定的内生性,国有经济规模的理论分析和对各国国有经济规模的实践考察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国有经济规模不是人为设定的 50%或者 30%,而由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发育内生决定的。国有经济规模超过合理的量,就会出现成本过高的不经济问题;相反,国有经济规模过小,国有经济的效用就得不到应有的发挥。

第二,经济发展水平与国有经济规模有一定的关系,从我国五十多年经济发展与国有经济规模的关系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国有经济规模经历了先上升然后再下降的过程,这与世界国有经济规模的变动趋势是基本相同的。

第三,与世界各国国有经济规模相比,我国国有经济规模明显偏大。不管是国有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

比重，还是国有单位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重，因此，优化所有制经济结构，从战略上对国有经济进行调整，适当压缩国有经济规模是今后一定时期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任务之一。

第四，从我国不同地区之间国有经济规模、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市场发育来看。国有经济规模与市场发育成熟度、市场机制的完善情况及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凡是市场发育成熟度高、市场机制较为完善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其国有经济规模相对较小；反之，市场发育滞后、市场机制不健全的地区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地区，其国有经济规模相对较高。

以上分析对于西部大开发的一个有益启示是：相对于东部地区而言，西部的市场发育程度、经济发展水平都大大低于东部，按照国有经济规模变动的一般趋势，在西部大开发的初期，西部地区的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相对不足，而这些对于西部国民经济的发展来讲又是不可或缺的因素，西部需要更多的国有经济来校正市场对资源配置中的失灵问题。因此，国家在西部大开发中首先要加大对西部基础设施的投入力量，将国有资产更多地配置到国民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行业中去。随着西部市场机制的进一步发育和经济的发展，西部也要积极调整自身的所有制经济结构和国有经济规模，在大力发展效率较高的非国有经济的同时，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存量结构和规模，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对 1949 年以来贵州省国有经济布局演变的系统分析表明，过去国有经济布局调整有成功，也有失误。历史启示我们，战线过长的国有经济布局是没有好处的，即使我们不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已不得不放弃部份国有企业。

贵州省国有经济布局调整要在有所为有所不为等原则指导下，明确规定调整方向。具体来讲，我省国有经济布局战略调整方向为：

调整方向之一：加强战略性经济领域。就贵州省来说属于战略性领域的有 78 个门类，占总门类的 38.05%，其中国有经济可以独资的门类有 17 个，占总门类的 8.29%。政府对战略性门类的控制应遵循

以下 4 项原则：第一，普遍进行公司制改造，凡由政府直接经营的部门应实行政企分开，建立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国有控股公司。第二，每个门类都应由几个国有控股公司经营，形成竞争格局，第三，每个门类中，政府只控制其中的骨干企业，国有资本应从非骨干企业和小企业退出。第四，政府应加强对战略性经济部门及国有控股、国有独资公司的管理，特别是对公司国有资本代表人的任免和财务监督。

下面分别就几大门类加以具体说明：

第一、资源开采门类：国家宜采取控股方式，把大企业控制在自己手中。控股方式有三：一是建立国家控股的、有其他非国有经济成份参加的有限责任公司；二是建立中方控股的中外合资公司；三是建立国家控股的上市公司。鉴于贵州资本及技术能力不足，可选择一些资源开发项目，采用租赁或 BOT 方式，把开采权和收益权让渡若干年给外国资本或省外资本金，到期收回。对这一门类的国有中小型企业，绝大部份应改为非国有形式。所有资源采掘业均应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和开采许可证制度，对于破坏生态环境的国有和非国有小企业，应一律关闭。

第二、能源生产和供应门类：生产型大型企业事采用国家控股方式由国家控制；利用当地资源的小煤矿、小电站，应放手非国有经济成份生产、经营，国有资本要从中退出。要积极推广煤炭开采与发电并举的坑口电站模式，以及流域水能开发与水力发电并举的滚动开发模式，组建如黔西南地电这样的国家控股的大型公司。大电网由国家控股公司经营管理。电价、煤价逐步放开由国内、国际市场调节。

第三、重型机械制造门类：宜采用国家控股的集团公司模式。主机厂由国家控股，主要零部件厂则可采取子公司或由集团公司参股的独立的零部件公司形式，与主机厂建立紧密协作关系。国有资本同样要从这一门类中的国有小企业退出，同时要推动这些小企业向小而专、小而精的方向发展，成为机械工业协作配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军事工业门类：今后仍然由国家垄断。但企业必须进行公司制改造，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与军事部门建立订货关系和商品交换关系。除少数企

业进行专业武器生产外，多数应继续贯彻军民结合的方针，以民品生产为主，同时设立特殊车间进行军品生产。这类军民结合的企业，也可实行国家控股的以下 3 类公司形式：即国家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国家控股的中外合资公司、国家控股的上市公司。原由地方管理的小型常规武器生产企业原则上转产或关闭。

第五、高技术门类：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是按照省委《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初步意见》所列 7 类高新技术，由省政府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攻关；另一条腿是动员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各种经济成份的力量，进行研究与开发。在组织形式上可采取国家独资公司、国家控股公司、国家控股的中外合资公司、国家控股的上市公司等形式。取得突破后，可把国有股权转让出去，再组建新的公司进行另一些重大项目的研究与开发。同时，要大力发展民营高科技公司，建立高校教育园区、高科技人才创立园区、留学生创立园区和高科技产业园区。另外，还应鼓励有条件的科研机构 and 高等院校开展省内外、国内外的合作研究与开发。

第六、金融门类：应积极发展与交通、招商、华夏等银行相类似的国有法人组成的有限公司制银行，发展象民生、汇通等民间色彩的银行，以及城市合作银行等地方性银行。允许外国银行在贵阳、安顺、遵义、六盘水、毕节、铜仁、兴义、凯里、都匀等城市建立分支机构，允许它们从事人民币业务。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也实行类似银行的体制，打击地下钱庄及高利贷活动。

第七、交通运输建设和经营门类：铁路可由国家独资改为国家控股公司建设和经营。国道、省道及高等级公路由国家控股公司、国家控股的上市公司建设和经营，也可采取 BOT 方式，将建设和经营权让渡给省外、港澳台和外国投资者，期满收回。机场和航空公司由国家控股、国家控股的上市公司建设经营，也可考虑组建中外合资的公司进行建设和经营。赤水河、乌江、南北盘江的航运可由国家参股建设和经营，也可以将现在的国有企业转为非国有经营公司。

第八、邮电通讯建设和运营门类：要改变由国有一个部门垄断经营的状况，组建若干个国家独资公

司、国有法人有限公司，互连网，宜由多家国有法人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和经营，也可组建民营企业，以促进外资等非国有经济经营。传呼机等无线通讯、网站允许集体、私营。

第九、公用事业门类：水、气、电、热的生产可采取国家控股公司方式进行，允许其他经济成分介入，公共交通除国有独资公司经营外，集体、私营、个体经济成分均可介入。

需要说明的是，国有经济加强战略性经济领域，并不等于不让非国有经济进入，也不等于不论大中小企业都要国有独资垄断，相反，应积极吸引非国有经济进入这些经济领域尤其是自然垄断行业，在引入市场机制和国有经济控制力逐步增强的情况下，还可以有计划地退出一些门类。

调整方向之二：逐步退出竞争性经济领域。属于竞争性经济领域的有 127 个门类，占总门类的 61.95%。这些门类包括：第一，城乡居民生存、发展、享受品生产的领域。如食品加工、纺织服装、家用电器、文体用品、高档消费品等。第二，机械、电子、化工、建材、橡胶等制造业领域（其中少数属于当前国有经济需要控制或垄断的部门，如大型电站设备制造、大型化学肥料生产、汽车生产等）。第三，商业、服务业领域。如商品的批发、零售、饮食及其他生活服务、宾馆、旅游、仓储、医疗、进出口贸易、服务贸易、中介服务等。这些领域最适宜于非国有经济进入，并能发挥很好的作用。

就贵州国有经济布局战略调整的方法设计来讲，一是确定战略性门类和企业名单，设计政府对这些门类和企业的方法；二是设计了国有资本退出竞争性领域的门类及步骤。从我省实际情况看，国有经济不可能立即全部退出竞争性经济领域，为此，我们设计了即退型、渐退型和并存型三种退出模式。

即退型，即省委省政府作出决策后，国有资本可以立即退出。初步设计有 49 个门类，占门类总数的 23.90%。这些门类是：土沙石开采业，粮食及饮料加工业，植物油加工业，屠宰及肉蛋加工业，其他食品加工业，糕点、糖果制造业，乳制品制造业，罐头食品制造业，发酵制品业，调味品业，其他食品制造业，

软饮料制造业，其他饮料制造业，纤维原料初步加工业，针织品业，服装制造业，制帽业，制鞋业，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制革业。皮革制品制造业，毛皮鞣制及制品业，羽毛（绒）及制品业，人造板制造业，木制品业，竹、藤、棕、草制品业，木制家具制造业，金属家具制造业，日用化学产品制造业，橡胶靴鞋制造业，其他橡胶制品业，日用橡胶制品业，橡胶制品业翻修业，塑料鞋制造业，其他塑料制品业，砖瓦石灰和轻质建筑材料，日用金属制品业，其他金属制品业，普通机械修理业，其他普通机械制造业，钟表制造业，餐饮业，居民服务业，旅馆业，租赁服务业，娱乐服务业，信息咨询服务业，计算机应用服务业，其他社会服务业。

渐退型，即国有资本先从独资退到参股地位，再由参股地位全部退出。初步设计有 46 个门类，占门类总数的 22.44%。这些门类是：棉纺织业，毛纺织业，麻纺织业，丝绢纺织业，针织品业，其他纺织业，造纸业纸制品业，印刷业，文化用品制造业，合成纤维制造业，塑料丝、绳及编织品制造业，塑料板、管、棒材制造业，泡沫塑料人造革、合成革制造业，水泥制品和石棉水泥制品业，玻璃及玻璃制品业，陶瓷制品业，耐火材料制品业，石墨及炭素制品业，其他类未包括的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工具制造业，金属丝、绳及其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轴承、阀门制造业，其他通用零部件制造业，铸锻件制造业，轻纺工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农、林、牧、渔、水利机械制造业，医疗器械制造业，专用机械设备修理业，摩托车制造业，日用电器制造业，照明器具制造业，日用电子器具制造业，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通用仪器仪表制造业，仓领储业，其他批发业，零售业，房地产经纪与代理业，公共设施服务业，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农、林、牧、渔服务业。

并存型，即在国有资本退出的门类中，保持一定数量的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企业。初步设计有 32 个门类，占总门类数的 15.61%。这些门类是指除战略门类、即退型、渐退型所涉及门类以外其他一切经济门类。

同时，要使贵州国有经济布局调整顺利进行，还

第一部分 西部大开发与贵州省国有经济布局调整：一个新的分析模架

§ 1 初始条件、国有经济调整与省区经济非均衡增长

一、初始条件、制度变迁与省区经济非均衡增长

(一) 现有理论分析与文献综述

初始条件、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De Melo Deniz 和 Gelb 为世界银行《1996 年世界发展报告》及世界银行对 CEE 和 NIS 的 25 个国的考察表明，制度变迁（经济的自由化）对各国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在他们看来，尽管各国的初始条件不一样，但由于制度变迁的速度不同，其经济增长在国与国之间具有较大的差异。简言之，是制度变迁而不是初始条件决定了各国的经济增长。而哈勒根、张军（1999）对 CEE 和 NIS 国家的研究并不支持上述结论，张军的二元回归表明，在初始条件制度变迁与 CEE 和 NIS 国家的经济增长方面，初始条件的情况如何对于国家之间经济增长的差异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而制度变迁并未显示出其应有的解释能力。换言之，是初始条件而不是制度变迁决定了各国的经济增长。周振华（1999）则建立了初始条件、体制变迁与经济增长的逻辑框架，并结合中国的体制变迁进行了探讨，但未对初始条件、体制变迁与经济增长进行现代经济学分析，并进行实证检验。洪名勇（1997，2001）曾经结合贵州及不同省的实际，就制度安排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进行了讨论。以上这些分析给我们研究区域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更为广泛的思维空间。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对诺思（1994a，1994b）的研究成果及世界银行的分析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并准备将初始条件、制度变迁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纳入区域非均衡增长的实证研究之中。在我们看来，在初始条件、制度变迁与区域非均衡增长之中，虽然初始条件对区域非均衡增长具有一定的影响，但主要的制度变迁而不是初始条件决定了区域非均衡增长。

(二) 初始条件的含义

按照世界银行的说法，初始条件主要是指转轨国家从计划走向市场的最初形态，如转轨开始时的人力资本存量，法律结构，法制意识及经济结构等。在本研究中，我们所讲的初始条件与世界银行所讲的初始条件相关但并不完全相等，在这里，初始条件既是前一时期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结果，又是经济进一步向前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条件，因此，从横向来看，它是一个静态的经济学概念，从纵向来看，又是含有动态之意。初始条件是指改革初期的制度及其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城乡结构、产业结构等的总称，它既是制度变迁的前提和条件，又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和前提。

(三) 经济体制及制度变迁

1、经济体制

对于什么是经济体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先评述目前几种主要观点，然后再给出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保罗·R·格雷戈里和罗伯特·C·斯图尔特（1988）将经济体制定义为“在特定地理区域内进行决策并执行有关生产、收入和消费决策的一组机制和制度”。在他们看来，经济体制是由对稀缺资源的配置进行决策并执行决策的各种机制、组织安排和规则。进一步讲，经济体制是多元的，经济体制的多元性可以用下列公式表示出来：

$$ES = f(A_1, A_2, \dots, A_n) \dots\dots\dots 1.1$$

公式 1.1 表明，经济体制 (ES) 是由它的属性 (A) 或特征所规定的，其中有 n 个属性。换言之，经济体制与财产权利并不相同，后者可以用单一特征来表达，前者则包括财产所有权等多种特征。那么，经济体制究竟包含哪些特征呢？按照格雷戈里和斯图尔特的研究，经济体制一般包括四个方面一般的特征。如果用 A_1 来表示经济体制的决策权安排结构 (集权制或分权制) 特征； A_2 示处理信息流动和调节经济体制内不同单位的机制 (计划和市场)； A_3 表示财产所有权的性质 (公共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 A_4 表示激励制度的性质 (物质激励或精神激励)，则公式 1.1 可以修订为：

$$ES=f(A_1,A_2,A_3,A_4) \dots\dots\dots 1.2$$

对于经济体制中决策的组织来说，如果决策主要是在组织的低层次作业，这种经济体制就是分权制；如果决策主要是由高层次作业，则经济体制属于集权制的。计划经济是指企业的经济活动主要由中央计划来调节，中央计划者同时设计相应的激励办法，诱导企业执行相关计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调节各企业的经济活动。财产所有权是区分经济体制的重要标准之一，一般地讲，财产所有权有 3 种形式：私人所有权，公共所有权和集体集体所有权等。经济体制的特征也可以表现在它的目标以及推动参与者实现这些目标的激励机制上。激励机制必须诱导低层组织参与者完成高层组织参与者的指令，激励机制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物质激励主要通过给予受奖者比工作较差的人更大的物质产品要求来促进合乎要求的行为；精神激励则通过赞扬受奖者对社会或企业的责任感来奖励合乎要求的行为，从而提高受奖者在团体中的社会地位。

普赖尔认为经济体制包括所有的那些结构、组织、法律与规则、传统、信息、态度、价值、戒律以及相应的行为规范，它们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经济行为和经济结果。普赖尔对经济体制的定义与诺思对制度的定义有许多相似之处，诺思把制度看作人类进行经济活动的行为规则，这一规则由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构成，前者包括宪法、法律及各类条例等，后者则包括理想、信念、道德、伦理及意识形态等。或许，周振华受到诺思的影响，在其《体制变革与经济增长》一书中探讨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时，将经济体制与制度行为相同的范畴进行了讨论。在周振华看来，制度界定了个体间的关系，指明谁对谁能干什么。因此，制度在一个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是建立人们互动的稳定结构，以降低不确定性。制度是各种社会规则的结合，制度作为一个集合概念，其总和称为制度结构，制度结构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正式规则，包括政治与司法规则、经济规则以及契约，即包括宪法、成文法、不成文法等、特别判例和个人契约等。第二个层次是非正式规则，包括禁忌、习惯、道德和传统。这种行为准则主要来源于传统的文化背景及意识形态因素。第三个层次是执行机能，包括衡量、监督、实施处罚等。诺思以为，执行机能的结构与其不完全的频率和程度，是影响交易成本和契约形式的重要角色，从而构成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交易过程中，执行有两种类型：一是第三者执行，使侵权一方付出某种程度的赔偿给受损一方，使违反合约付出代价；二是自发执行，即信守合约。

在众多的制度研究文献中，樊纲（2000）对经济的“体制结构”进行了新的定义，他将一个处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经济分为两大部门，国有部门 S 和非国有部门 N；它们所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比重定义为“经济的体制结构”，用 J 表示：

$$J_0=\frac{S_0}{N_0} \dots\dots\dots 1.3$$

J_0 指的是在任一初始时点上经济的体制结构。假定各部门效率的差别在长期内体现在各部门的增长率的差别上，并定义 g^s 为国有部门的增长率， g^n 为非国有部门的增长率， $g^s < g^n$ 。这一假定称为体制改革的基本假定，因为没有这一点，改革就不需要进行了。

在这个“基本假定”下，在较长的时间里 ($t \rightarrow \infty$) 则有：

$$J_t = \frac{S_0(1+g^s)^t}{N_0(1+g^n)^t} = J_0 \frac{(1+g^s)^t}{(1+g^n)^t} \xrightarrow{t \rightarrow \infty} 0 \dots\dots\dots 1.4$$

1. 4 式的经济含义是，无论经济体制结构的初始状态 J_0 如何，即无论开始时非国有经济多么弱小，只要非国有经济的效率及增长率比国有部门高，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将趋于缩小。 J_t 趋于 0，不意味着国有部门在绝对量上不增长，只是相对地缩小，而且 J 在现实中并不一定就趋于 0，而是趋于一个比较小的“均衡值”，也就是国有部门，仍在经济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只不过，这个均衡比例即使在将来也会随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变化。

就本研究来讲，我们对经济体制、制度的理解同样受到诺思的影响。即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规范地说，制度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制度变迁决定了社会变迁的方式，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在制度变迁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讨论方面，我们把制度看成是由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及实施机制所组成的集合，如果用 $B1$ 表示正式规则向量，用 $B2$ 表示非正式规则向量，用 $B3$ 表示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实施，则制度 I 可表示为：

$$I=f(B_1, B_2, B_3) \dots\dots\dots 1.5$$

需要说明的是，在进行制度变迁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分析时，由于资料等条件的限制，我们将用樊纲经济的体制结构来替代制度结构，即 J 来替代 I 。

2、制度变迁

制度有供给，也有需求，当制度有供给与制度需求相吻合的时候，我们称之为制度均衡，反之，称为制度非均衡。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制度均衡也可能出现的，此时制度有一定的稳定性特征，换言之，制度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变化过程中，因为随时变化的制度也许没有供给主体，更重要的在于没有需求主体，时刻变化的制度无法给微观经济主体提供稳定的预期激励。但从较长的时期看，制度非均衡又是必然的。一项制度不可能适应所有的环境情况，即不存在任何环境条件下都适用的制度。社会经济环境变化了，经济主体就会产生对新制度、新规则的需求，此时，旧制度要么被抛弃，要么进行自我扬弃，以适应新环境，要么就得补充新的内容，进行自我创新，提高自己的生存，即制度象动植物生命体一们，它也有生命，有生，也有死。制度的“生、老、病、死”就形成了制度变迁。所谓变迁，实际上是权利和利益的转移的再分配。

二、初始条件、国有经济调整与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

初始条件、国有经济调整速度与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的分析提出受到了已有的研究成果初始条件、改革速度与经济增长分析方面的启示，在现有的研究文献中，有关研究成果主要有两种观点，两种观点的简单逻辑如图 1.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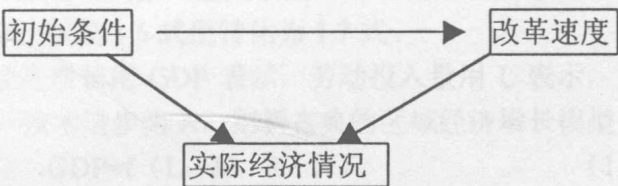


图 1. 1: 初始条件、改革速度与实际经济情况之间的逻辑关系

在图 1. 2 中的两个箭头分别代表了这方面研究的两派观点，一派观点认为，较快的改革速度导致较好的实际经济状况，但由于某些国家改革的初始条件不那么好，快速的经济

改革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例如推行全面彻底的激进式改革的话，经济情况将会更好。第二派观点虽然也认为需要进行市场化改革，但认为在改革过程中有各种市场失灵，如垄断、信息不对称、产权模糊、不完全契约等。根据这种特点，最适宜的改革方式应是贝叶斯式的，即渐进的和不断修正的。只有当经济中暴露出实际问题时，政府才应着手对具体问题的解决，在没有问题时，就不要轻易地制造问题。世界银行运用 26 个国家的有关资料对初始条件、改革速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转轨国家的经济增长取决于改革速度。而威廉·哈勒根和张军（1999）运用相同的资料所进行的研究表明，世界银行的研究忽视了其中许多重要的东西，尤其是初始条件对改革速度的约束，因此，初始条件对转轨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周振华（1999）从理论探讨了经济增长的结构效应，并构建了一个关经济条件、制度结构、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部分学者在研究区域经济增长时对产业结构效应和所有制结构效应的分析。对此，我们将借鉴有关研究成果，构建一个初始条件、制度变迁与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的分析框架，并把它运用于中国的实证分析之中。其三者的关系如图 1.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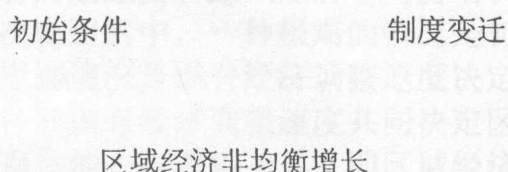


图 1.2: 初始条件、制度变迁与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

初始条件与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国内分析区域经济增长的主流观点，这一观点反映到政府的政策导向上就是实行区域资源开发战略，尤其是自然资源的开发战略。关于制度变迁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洪名勇（1997，2001）结合贵州实际情况，将制度安排用于对贵州贫困落后的解释之中，并分析了“一路之隔，天壤之别”的两村经济发展情况。并在陈宗胜等人（1999）研究的启发下，结合我国省区经济的非均衡增长，从制度变迁的省区差异这一新的视角对各省区经济增长进行了分析。我们的结论是：制度变迁对省区经济非均衡增长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凡是制度变迁（市场化）较快的省区，其经济增长速度一般都是经济增长较快的省区，两者之间有很好的对应性。

在图 1.3 中，初始条件不仅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前提，而且也作为不同的制度变迁速度（主要是指体制改革的市场化速度）提供了相应的基础条件，从而间接地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体制改革的市场化速度从短期来看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和外生变量，但从长期考虑它又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结果和内生变量。图中的实线表明，初始条件、制度变迁与区域经济增长已有的逻辑关系，虚线表明一种可能存在的逻辑。这样，在我们的分析框架中，新古典的区域增长模型 1.6 式便转化为 1.7 式。

假定区域经济增长用 GDP 表示，劳动投入量用 L 表示，资本投入量用 K 表示，土地投入用 R 表示，技术进步为 A，则新古典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型为：

$$GDP=f(L, K, R, A) \quad (1.6)$$

在考虑经济增长中的制度变量 I 之后，从短期来看，区域经济增长模型便转化为：

$$GDP=f(L, K, R, A, I) \quad (1.7a)$$

如果从较长的时期看，不同的经济状况不成为制度变迁快慢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此时，制度变迁的速度不仅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的速度，而且又受制于经济增长的具体情况。例如，经过改革开放 20 多年的发展，东、中、西经济的非均衡增长又为其下步推进其本区

域内体制的市场化进程提供了不同的基础和条件，与西部省区经济增长较慢相比，快速增长的广东、上海、浙江、江苏等省在推动体制的市场化进程中将会走得更快。这样，制度变迁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又共有以下关系：

$$I=f^{-1}(G) \quad (1.7b)$$

在 1.7b 中，G 表示区域经济状况。1.7b 式表示，I 制度变迁对于区域经济增长来讲是内生的，而不是给定的既定前提。

三、西部大开发与国有经济调整——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在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简要评析的基础上，构建一个能用于实证分析的解释西部地区如贵州省与东部地区经济非均衡增长的新框架。为此，我们将把“经济的体制结构”这一制度因素引入到西部如贵州省与东部地区经济非均衡增长过程中来，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重点探讨初始条件——国有经济调整速度——经济增长的关系。这样图 1.2 就可以修改为图 1.3。图 1.3 表明了初始条件、国有经济调整速度和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的决定因素中，一种极端的情况是初始条件决定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增长，另一种极端情况是国有经济调整速度决定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增长，第三种情况是初条件和国有经济调整速度共同决定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增长，图中的虚线表示可能存在的一种逻辑关系，即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增长对于下一步的国有经济调整具有重要作用。受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启示，就我们的研究来看，即使不说国有经济调整对区域非均衡增长具有唯一决定性的影响，至少国有有经济调整也是区域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因素，即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只有初始条件是不够的，还必须加进另一块基石——国有经济调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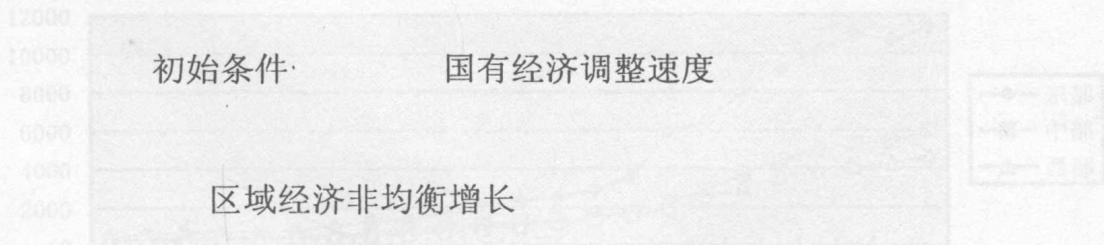


图 1.3：初始条件、国有经济调整速度与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

§ 2 国有经济调整与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的分析

在我们看来，省区经济的非均衡增长，仅有初始条件是不够的，国有经济调整对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也具有重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我国不同区域之间经济非均衡增长与国有经济调整情况得到说明。为了分析问题的方便，我们将整个经济部门划分为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这样，国有经济的调整：一是可以通过国有经济占经济总产出的变化或者非国有经济占总产出的变化来进行说明，二是通过国有经济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或者非国有经济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来进行说明，三是可以通过国有经济单位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重或者非国有经济单位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重的变化来进行说明。下面我们主要从非国有工业经济占总产值比重的变化，非国有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变化，国有单位职工占全部职工比重的变化三个方面来分析国有经济的调整情况。

一、国有经济调整：工业国有经济调整与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

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非国有经济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差不是太大，非国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1978 年东部地区为 22.77%，中部地区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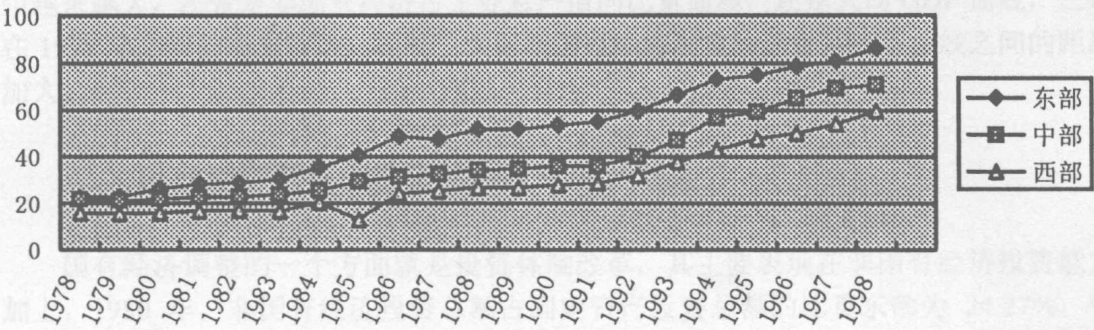


图 1.4：1978～1998 年三大区域非国有经济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变化情况

注①：本研究报告所讲的东部、中部和西部不是指过去统计上所讲的东部、中部和西部，而是根据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对东部、中部和西部进行了调整，即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吉林、黑龙江、山西、安徽、江西、湖北和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注②：资料来源：根据《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整理计算。

21.83%，西部地区为 15.65%；东部与中部只相差不到一个百分点（0.94），中部与西部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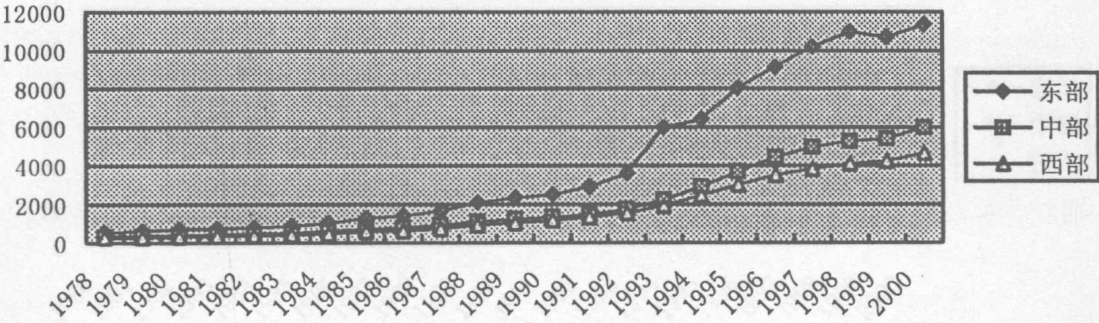


图 1.5：1978～2000 年东中西人均 GDP 变化情况

资料资料来源：根据《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1）有亲资料整理计算。

差只有 6.18 个百分点，东部与西部相差 7.12 个百分点。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国有经济调整之后，到 1998 年非国有经济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东部地区为 86.22%，中部地区为 70.86，西部地区为 59.63%；东部与中部相差 15.36 个百分点，比 1978 年扩大了 14.42 个百分点；中部与西部相差 11.23 个百分点，扩大了 5.05 个百分点；东部与西部相差 26.59 个百分点，扩大了 19.47 个百分点。人均 GDP1978 年东部地区为 549.24 元，中部地区为 310.64 元，西部地区为 263.20 元，东部与中部相差 238.6 元，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相差 47.44 元，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相差 286.04 元。至 2000 年，人均 GDP 东部地区为 11334.46 元，中部地区为 5982.38 元；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相差 5352.08，比 1978 年扩大了 5113.48 元；西部地